

万隆精神对印尼外交政策的规范塑造 与中印尼关系实践

潘 玥

摘要：万隆精神作为发源于南南合作的重要国际规范，对印尼外交政策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万隆会议的东道主和发起国，印尼对万隆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万隆精神通过规范内化、制度化和创新性实践等路径，深刻塑造了印尼的外交身份与政策取向，体现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推动区域多边主义和南南合作的深化等方面。在中印尼关系发展进程中，万隆精神为双方构建了共同的规范认知基础，推动了两国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愿景对接的过程中，万隆精神的规范价值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当前，随着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和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万隆精神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国家利益与规范价值的张力、文化认知与战略理性的平衡、地缘政治竞争与区域合作的协调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南方重要力量的中国和印尼，应在践行万隆精神的基础上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南南合作走深走实，也将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展望未来，万隆精神作为重要的国际规范资源，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提供重要的规范指引与实践智慧。

关键词：万隆精神；规范塑造；中印尼关系；南南合作；全球南方

收稿日期：2024—10—25

作者简介：潘玥（1991—），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印尼国别与东南亚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印尼投资及其‘安全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D24YHO01）的阶段性成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型。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的增长上，更反映在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和战略主动性上。在这一进程中，区域合作的深化与规范政治的兴起成为重要特征，传统的基于实力的国际政治逐渐让位于基于规范和制度的国际协作。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为“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和全球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其外交政策的演变具有特殊的意义。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会议确立了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等重要规范，这些规范不仅塑造了印尼的外交政策取向，也对整个后殖民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在新形势下，我们应积极弘扬万隆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以促进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展，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惠及亚非及其他地区人民。^①在中国—印尼关系的发展中，万隆精神始终是重要的规范性力量，引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万隆精神所倡导的核心规范，不仅为中印尼两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建立基于规范的互动框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更为双方克服意识形态差异、化解历史分歧、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行动指南。万隆精神体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2025年是中印尼建交75周年、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和印尼独立8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一历史性时刻为我们重新审视万隆精神对中印尼关系的深远影响赋予了时代意义。

那么万隆精神如何持续影响印尼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这种影响又如何具体体现在中印尼双边关系的发展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以规范扩散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规范性力量如何通过制度化、内化等机制，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这一理论视角可突破传统规范扩散研究多关注西方规范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局限性，聚焦源自全球南方国家的规范如何塑造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中印尼关系为具体案例，探讨万隆精神这一重要规范如何在双边关系中得到实践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规范性力量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外交实践，也有助于把握中印尼关系发展的规范内核与深层逻辑。

^① 《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第2版。

一、从历史到当代：万隆会议的学术脉络

万隆精神作为二战后亚非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重要历史遗产，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万隆精神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万隆会议及其精神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脉络。

（一）历史遗产与历史意义

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不同国家的学者基于独特的历史经验和学术传统，对这一议题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解读。西方学界早期对万隆会议持有审慎、复杂且矛盾的态度。以美国学者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态度体现了这种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强烈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亚非人民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万隆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基于文化或宗教情感的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它过于情感化和本质主义，^①持有某种居高临下的立场。这种矛盾态度在西方政府的官方评估中也有所反映。英国的评估报告以居高临下的语气描述东方“年轻、渴望、沉醉于新的民族主义”^②，而美国国务院的情报评估则不得不承认万隆会议的重要性。^③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分析家观察到，万隆会议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和反西方情绪是相对克制的，这不仅是西方政府（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印度和中国等主要参与国无意将会议变成反西方论坛。^④事实上，万隆会议推动了国际格局的非殖民化进程，为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奠定了

① 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② W. R. Crocker, "Personal Impressions by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London: Far Eastern Department, The National Archives, DO35-6099, 1995.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sults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Dispatch from British Embassy,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Lond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lligence Report No. 6903, April 27, 1955,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D2231/373, FO 371/116986.

④ Amitav Acharya, "Study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rom a Global IR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4, 2016, p. 345.

基础，其历史意义最终也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基本认可。

随着冷战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开始重新评估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有西方学者认为，尽管万隆会议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变化和美苏冷战等因素而“瓦解”，但它在从国际殖民秩序向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全球国家系统秩序的“过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新秩序将新独立的国家置于与前殖民者平等的主权地位。^①万隆会议不仅是去殖民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更是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转折点。^②

亚非学者对万隆会议的研究则更强调其积极意义。印尼学者罗斯兰·阿卜杜勒加尼（Roeslan Abdulgani）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会议筹备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强调万隆会议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东西方阵营之外的新平台，是亚非国家“第一次不经由西方中介而直接对话”的历史性时刻，开创了南南合作的先河。^③印度学者维尼特·塔库尔（Vineet Thakur）则从不结盟运动的视角，阐释了万隆会议对第三世界团结的历史贡献，认为会议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后殖民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范式。^④

中国学者对万隆会议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演进脉络。早期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强调万隆会议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认。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讨论和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为万隆精神。其中包含了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⑤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中国政府以及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代表团的關鍵作用与杰出贡献。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积极肯定和表达亚非国家和人民要求和平、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避免会议陷入关于

① Ahmad Rizky Mardhatillah Umar, “Rethinking the Legacies of Bandung Conference: Global De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11, No. 3, 2019, p. 461.

② Christopher J. Lee, “At the Rendezvous of Decolonization: The 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18-24 April 1955”, *Interventions*, Vol. 11, No. 1, 2009, pp. 81-82.

③ Roeslan Abdulgani, *The Bandung Connection: Konferensi Asia-Afrika di Bandung Tahun 1955*, Jakarta: PT Gunung Agung, 1981.

④ Vineet Thakur, “An Asian Drama: The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194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41, No. 3, 2018, pp. 673-675.

⑤ 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0—14页。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①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学界更多地讨论万隆精神与当代国际关系的契合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亚非学者对万隆会议积极意义的重视，强调了万隆会议在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合作、促进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学者开始从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他们不仅关注会议的政治影响，还探讨在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领域的深远意义。他们认为万隆会议激发了亚非人民的文化自觉和亚非文化认同，^②推动了后殖民话语的形成，对后殖民时期亚非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多维度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万隆会议的认识，也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南南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不管国际格局如何持续演变，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仍将继续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

（二）国际关系视角与当代价值

国内外学者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对万隆会议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流派：建构主义学者强调万隆会议在塑造发展中国家集体身份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通过对万隆会议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深度的观点。他指出，万隆会议创造性地构建了“亚非新兴力量”这一集体身份，为后殖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确立独特地位提供了规范基础。^③从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的视角出发，阿查亚强调万隆会议是新独立国家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彰显“代理权”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叙事，也证明了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④在探讨万隆会议的遗产时，他特别关注万隆会议如何挑战西方的传统观点，包括促进集体防御条约的合法化、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促进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兴起，以及强化非殖民化、人权、普遍主义和倡导文明间的

① 余建华：《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团结报》，2019年4月18日，第2版。

② Naoko Shimazu, “Diplomacy as Theatre: Stag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8, No. 1, 2014, p. 225.

③ Amitav Acharya, *Asia Rising: Who Is Leading?*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④ Amitav Acharya, “Study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rom a Global IR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4, 2016, pp. 342-357.

“礼遇”而非“冲突”等新兴全球规范。^①值得注意的是，阿查亚的研究视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从早期对会议积极作用的强调，逐渐转向对会议遗产的全面评估，包括关注会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亚洲的两极分化和对威权倾向的潜在鼓励。这种认识的演进不仅展现了其学术思想的成熟，也为我们理解万隆会议在全球国际关系中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

在规范层面，万隆会议确立了协商一致的共识性决策程序，形成了特定的“亚洲方式”，将不干预、主权平等、和平相处、不结盟、非正式等作为核心规范。这些规范与“求同存异”原则以及“团结、友谊、合作”精神一起，构成了著名的“万隆精神”，并在此后的东盟发展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实现了“万隆规范”向“东盟规范”的转化，展现出亚洲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在经验和规范层面的互动共生关系。^②

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强调万隆会议不仅在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更是二战后多极化体系中的关键一环。^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逐步深化，从对单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转向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批判性思考。他深入分析了万隆会议后的世界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持续挑战，特别关注多极化体系中霸权问题的解决路径。他将万隆会议放在更广阔的全球政治经济背景下进行考察，强调其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和反抗北方国家霸权方面的持久影响，^④这种多维度和动态发展的认识框架为我们理解万隆会议的当代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万隆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中，亚洲学者贡献了独特的见解。印尼学者里扎尔·苏克玛（Rizal Sukma）强调万隆精神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具有重要启示。^⑤新加坡学者基肖尔·马布巴尼

① Amitav Acharya, “Who are the Norm Makers?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Global Governance*, 2014, pp. 405-417.

② 郑先武：《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31—48页。

③ Samir Amin and Rémy Herrera, “Fifty Years after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owards a Revival of the Solidarity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6, No. 4, 2005, pp. 546-556.

④ Samir Amin, “From Bandung (1955) to 2015: Old and New Challenges for The States, the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nterventions*, Vol. 19, No. 5, 2017, pp. 609-619.

⑤ Rizal Sukma,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An Indonesian View”, *Asian Survey*, Vol. 35, No. 3, 1995, pp. 304-315.

(Kishore Mahbubani)则认为万隆会议倡导的互尊互信原则对化解当今世界文明冲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①这些观点共同强调了万隆精神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历史贡献。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加速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有关万隆精神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新趋势:首先,学者们从全球南方视角重新审视万隆精神,关注它对南南合作、全球发展议程的启示。其次,开始探讨万隆精神与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的契合性。再次,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万隆精神对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的启示作用。

中国学界也对这一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学者对万隆会议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学术脉络。苏长和教授强调万隆会议是推动战后世界新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发展中国家首次以独立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金灿荣教授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和平原则的确立以及南南合作的发端三个维度概括了万隆精神的核心内涵。吴志成教授认为万隆会议不仅谱写了中国外交的新篇章,其精神在当今国际关系发展中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外交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周边外交理念等实践中都得到了创新发展。高飞教授进一步指出,要让“一带一路”倡议与万隆精神相契合,需要在坚持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寻求利益交汇点、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等方面作出努力。^②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万隆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万隆精神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思路。

(三) 万隆会议与印尼外交政策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万隆会议与印尼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主要脉络。首先是历史进路。万隆会议是印尼独立后外交政策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自由积极”(bebas-aktif)外交原则的正式确立。这一原则强调印尼在冷战格局下保持独立自主,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印尼此后数十年的外交实践。印尼“自由积极”外交政策深深植根于印尼

^①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p. 115.

^② 张君荣:《让万隆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2日,第A1版。

的国家理念和文化传统。它与开国五基“潘查希拉”（Pancasila）所倡导的独立自主、民主协商等价值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求同存异”（Bhinneka Tunggal Ika）的包容性思维，同时也承载着印尼社会“互助精神”（Gotong Royong）的文化内涵。这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使印尼在国际舞台上既能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又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实践模式。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和理念基础，也是理解印尼外交政策的重要维度。

其次是制度视角。学界普遍认为，万隆会议为印尼构建了重要的外交制度遗产，尤其体现在斡旋外交的行为模式上。印尼在万隆会议上扮演的斡旋者角色，为其日后在东盟等区域多边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奠定了基础。^① 这些研究表明，万隆会议不仅为印尼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国际关系的制度化行为范式，这种制度遗产对印尼的区域外交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是身份建构的视角。万隆会议塑造了印尼作为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国际身份。^② 这种身份认知影响了印尼的战略选择，使其在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区域一体化等议题上始终保持积极态度。^③ 在大国竞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种身份认同也成为印尼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思想资源，体现了印尼在地区秩序重构中谋求更大话语权的努力。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万隆会议与印尼外交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历史研究聚焦于万隆会议确立的“自由积极”外交原则及其历史延续性；制度研究关注万隆会议为印尼参与区域多边机制提供的制度经验和行为范式；身份研究则探讨万隆精神对印尼国际身份的塑造作用。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理论视角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万隆精神的规范扩散机制。其次，对印尼具体外交实践的影响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支撑，对印尼“自由

①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262页。

② Jamie Mackie,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Indonesian Aspects”, in Antonia Finnane and Derek McDougall, eds., *Bandung 1955: Little Histories*, Melbourne: Monash Asia Institute, 2010, pp. 12-17.

③ Dzikiera Pesona Sadewa and Falhan Hakiki, “Dinamika Kebijakan Politik Luar Negeri Bebas Aktif Indonesia Melalui Gerakan Non-Blok (GNB)”, *Jurnal Lemhannas RI*, Vol. 11, No. 1, 2023, hlm. 13-28; Firdhan Dwi Kurniawan, et al., “Pengaruh Prinsip Bebas-Aktif Dalam Politik Luar Negeri Indonesia: Studi Kasus BRICS”, *Merdeka: Jurnal Ilmiah Multidisiplin*, Vol. 1, No. 2, 2023, hlm. 356-362; Ningrum Natasya, *Gerakan Non-Blok dalam Masa Indonesia 1992-1995: Kepemimpinan*, Fakultas Hukum Universitas Sumatera Utara, 2003.

积极”外交政策与万隆精神互动关系的系统分析较少；对万隆精神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的实践创新研究不够深入；对万隆精神作为国际规范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规范性分析尚显不足，特别是在解释新兴大国与地区大国互动过程中规范因素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从全球南方视角对万隆精神时代价值的理论阐释还有待加强。这些都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也为深化万隆精神与印尼外交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规范扩散理论的本土化解读

国际规范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自建构主义兴起后，规范研究得到持续拓展和深化。规范扩散理论的重要贡献者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认为规范是行为体在特定情境下对“适当行为”的共同认知和期待。规范扩散则是指这种共同认知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传播与内化过程。他们提出了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规范的出现、规范的瀑布效应（norm cascade）和规范的内化三个阶段，并探讨了规范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①这一理论框架特别适合解释万隆精神在印尼外交政策中的演化，因为它不仅关注规范的形成机制，迎合了非西方国家视角下规范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的未来方向，^②更强调规范在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与创新，这与印尼作为规范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高度契合。现有的研究也有从规范扩散的角度深刻揭示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和规范意义的范例。万隆会议实际上成了“规范创建”和“规范扩散”的场所，^③会议所适用的共识性决策程序被认为是其

①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1998, pp. 887-917.

② 袁正清、肖莹莹：《国际规范研究的演进逻辑及其未来面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3期，第143—144页。

③ Amitav Acharya, “Who are the Norm Makers?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and the Evolution of Norms”, *Global Governance*, 2014, pp. 405-417.

重要的规范性遗产之一，^①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及其所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第一，规范生成存在特定的微观机制，包括规范创新者（norm entrepreneur）的推动、关键事件的触发以及制度化过程的积累。在印尼的案例中，苏加诺（Soekarno）、哈达（Mohammad Hatta）等印尼建国领导人扮演了规范创新者的角色，万隆会议则是关键的触发事件，而东盟等区域机制的建立则体现了制度化进程。第二，规范传播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受到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制度遗产的深刻影响。这一假设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万隆精神在印尼的外交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持续性和适应性。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框架。在规范主体层面，重点考察印尼作为规范接收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特别关注印尼如何将万隆精神与本国外交传统相结合，并在实践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规范网络层面，分析万隆精神在东盟、东盟与中国关系等区域多边机制中的扩散路径，探讨印尼如何运用这些平台推广其规范理念。在规范制度环境层面，探讨国际体系变迁对规范扩散效果的影响，尤其是探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万隆精神作为国际规范的适应性与创新性。

在理论创新层面，本文重点突破三个方面。首先，对规范扩散理论进行本土化解读，将其与印尼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区大国身份相结合，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这种本土化解读不仅考虑了印尼的后殖民历史经验，也充分关注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国家的地区影响力。其次，为后殖民国家外交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深化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范建构中主体性的理解。这一视角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规范被动接受者的局限，强调它们在规范创新和传播中的主动性。最后，在中印尼关系研究方面实现理论突破，系统性地将规范因素纳入双边关系分析框架，为理解新兴大国与地区大国互动提供新的理论工具。

这一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有效解释万隆精神在印尼外交政策中的持续影响力；二是可以清晰展现印尼在

^①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Introductio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p. 10-11;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8-81.

区域规范建构中的独特作用；三是有助于理解中印尼关系发展中的规范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特别是印尼在南海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重大议题上的政策实践，验证理论假设的解释力，并探讨这一理论框架在更广泛的区域研究中的适用性。这一研究不仅将推进规范扩散理论的发展，也将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范演化中的作用提供新的思路。

三、万隆精神的规范性内涵

万隆精神的规范性内涵可以从历史语境、规范要素和理论分析三个维度来加以理解。首先，万隆会议的召开产生自后殖民时代亚非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背景，而印尼传统文化中“互助互利”的理念也为会议精神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础。其次，万隆精神的核心规范要素包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和求同存异，这些原则与印尼“潘查希拉”建国五基、“协商一致”（*musyawarah*）传统以及“求同存异”多元一体的国家理念高度契合。从规范扩散理论视角看，万隆精神通过特定机制实现了规范的生成、传播与内化，并通过提供行为准则、形成身份认同、构建互动模式等途径持续影响印尼的外交实践，为理解印尼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万隆会议的历史语境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亚非各国相继获得独立，但仍面临着新老殖民主义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新兴独立国家，印尼凭借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和文化传统，积极推动亚非团结。1954年，印尼政府首先提议召开亚非会议，并获得了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会议决定在印尼召开，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的倡议，以及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万隆的个人情感。^①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了会议的重要性，称之为“世界

^①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著，李达南译：《印尼总理眼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6年2月23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6/0223/c222139-28144084.html>。

历史的新的起点”。^①会议所体现的团结一致、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谊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对印尼以及亚非国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印尼传统文化中“互助互利”的理念与万隆会议倡导的团结合作精神高度契合，这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互助互利”概念源于印尼爪哇文化传统，是一种强调社区成员相互帮助、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互助理念。这一理念要求社区成员在农耕、建房、婚丧嫁娶等公共事务中相互支援，体现了“利他即利己”的价值观。^②苏加诺总统将其上升为国家治理理念，使其成为印尼“潘查希拉”建国五基中社会正义思想的重要来源。^③这种互助传统对印尼社会和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内层面，它促进了多元族群的和谐共处，强化了社会凝聚力；在对外关系层面，它遵循“为共同的美好事业而合作，携手并进”的原则，影响了印尼的外交理念，使印尼在国际事务中更倾向于寻求合作共赢，致力于保持多边主义精神以应对全球挑战，这种思维方式在万隆会议的筹办、印尼推动东盟一体化的过程和应对公共卫生挑战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④

当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中印等国的双边关系中得到实践，但尚未形成广泛认同的国际规范。万隆会议将这一原则上升为亚非国家的共同主张，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对构建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集体诉求。在印尼“潘查希拉”建国五基强调的社会正义理念指导下，万隆会议为后殖民国家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提供了重要平台。

（二）万隆精神的核心规范要素

万隆精神作为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国际规范体系，其核心要素深深植根于印尼的文化传统与国家实践，同时又超越了地方性限制，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从规范理论视角来看，这些核心要素既包含了规范的构成性维度（constitutive dimension），即塑造行

① “Pidato Selamat Datang Bung Karno pada Pembukaan KAA 1955”, *Koran Sulindo*, April 19, 2022, <https://koransulindo.com/pidato-selamat-datang-bung-karno-pada-pembukaan-kaa-1955/>.

② Agus Suwignyo, “Gotong Royong as Social Citizenship in Indonesia, 1940s to 1990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3, 2019, pp. 387-408.

③ Agustinus W. Dewantara, *Alangkah Hebatnya Negara Gotong Royong: Indonesia dalam Kacamata Soekarno*, Yogyakarta: PT Kanisius, 2017.

④ Jona Widhagdo Putri, “Good Momentum of Ties Should Continue”, *China Daily Global*, April 6, 2021, <http://epaper.chinadaily.com.cn/a/202104/06/WS606b92f3a31099a2343552d4.html>.

为主体身份认同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规范的规制性维度（regulative dimension），即指导具体外交实践的行为准则。通过系统梳理，可以将万隆精神的核心规范要素归纳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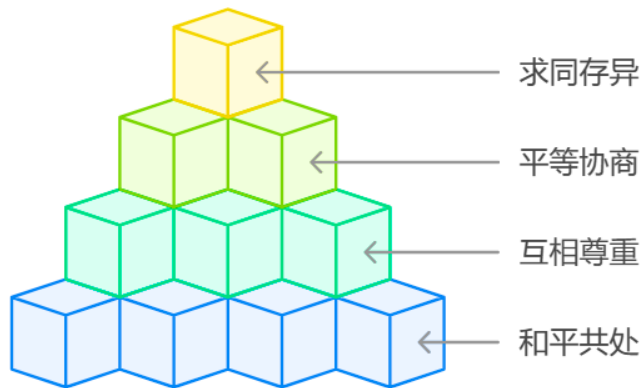


图1 万隆精神的核心规范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和平共处构成了万隆精神的基础性规范要素。这一规范与印尼传统文化中“和谐”（harmoni）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其规范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认知层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打破了冷战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对立；二是在行为层面，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而非武力手段处理国际争端。这种和平共处理念既来源于印尼多元文化社会的历史实践，^①也反映了后殖民时期亚非国家对和平发展的共同追求。

互相尊重作为万隆精神的核心规范要素，深深植根于印尼强调“尊重”（hormat）的文化传统。从规范建构的视角看，这一要素具有双重规范属性：在价值层面，它强调国家间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体现了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追求；在实践层面，它要求各国在具体交往中尊重彼此的主权独立和传统文化，反对以强凌弱、以大压小。这种规范取向既符合印尼群岛文明重视礼仪、强调互敬的传统，也为构建更加平等的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① Frial Ramadhan Supratman, “Menjadi Muslim Barat atau Muslim Asia?: Warisan Intelektual Turki dan Konferensi Bandung 1955”, *Jurnal Sejarah*, Vol. 1, No. 1, 2017, hlm. 52-80.

平等协商这一规范要素源自印尼社会“协商一致”（*musyawarah*）的决策传统，但其规范意涵则超越了地方性实践。从规范扩散的角度看，这一要素在国际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它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原则，强调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应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另一方面，它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协商精神不仅是万隆会议达成共识的关键机制，也是印尼参与区域多边合作的重要行为准则。

求同存异作为万隆精神的创新性规范要素，体现了印尼“多元统一”的国家理念在对外政策中的延伸。这一规范要素具有显著的建构性特征：在认知维度，它承认并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在实践维度，它强调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这种规范理念来源于印尼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经验，为处理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上述四个核心规范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规范体系。从规范理论的视角看，这些要素不仅为印尼的外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也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在国家层面，这些规范要素深刻塑造了印尼的外交政策取向和行为模式；在区域层面，它们为东盟等多边机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在全球层面，它们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元化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思想资源。这种多层次的规范影响力，使得万隆精神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成为理解和构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和原则。

（三）规范扩散理论视角下的万隆精神

在规范扩散理论的框架下，万隆精神不仅仅是由一系列国际行为规范组成的集合体，更是印尼民族文化核心与其外交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综合产物。其核心规范要素包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和求同存异，这些要素不仅扎根于印尼丰富的文化传统，还通过万隆会议的国际平台得到了广泛认可，最终推广到全球外交实践中，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规范资源。

万隆精神的诞生深受印尼文化中“和谐共生”理念的影响，这一理念在印尼国家箴言“求同存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东道国，印尼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隆会议上将这一文化理念转化为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原则，为亚非国家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基础。通过多边协

商机制，万隆精神迅速传播至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其中印尼的文化传统为万隆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万隆会议本身则成为规范传播的关键平台。在传播阶段，万隆精神不仅通过区域组织和多边外交平台得到推广，而且在各国的实践中逐步丰富其内涵。这种规范传播的过程是互动的，区域内外国家的反馈进一步深化了万隆精神的意义，使其从单一的外交原则发展成为具有普适性的国际行为规范，尤其在推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万隆精神的影响力和实践价值得到了显著增强。

从规范内化的角度来看，万隆精神在印尼的嵌入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涉及认知、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万隆精神通过国民教育和文化传播逐渐成为印尼社会的广泛共识，其核心理念不仅被纳入中小学课程，也是外交官培训的核心内容，从而深入影响到国家行为体的决策认知。在制度层面，印尼将万隆精神作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确保国家的对外行为与其规范保持一致，特别是在和平解决争端、推动多边合作等政策中，万隆精神成为指导性原则。在实践层面，万隆精神在具体外交活动中得到了贯彻，尤其体现在印尼对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中，这种实践不仅强化了万隆精神的影响力，还将其内化为印尼外交的长期行为逻辑。这三个层面相互支持，共同确保万隆精神在印尼的内化和实际应用。

万隆精神塑造印尼国家行为的三个核心机制是：提供行为准则，它为印尼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和平、合作与包容的原则设定了标准；形成身份认同，它使印尼在国际舞台上将自己定位为“南南合作领导者”和“区域合作推动者”，强化了其外交独立自主的传统；构建互动模式，它通过强调对话与协商，规范了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尤其在印尼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南南合作的外交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三种机制共同作用，说明万隆精神是印尼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决定着印尼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行为和立场。

通过规范生成、传播和内化等多重机制，万隆精神在全球外交实践中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它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塑造上，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外交相结合的范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万隆精神的规范性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核心理念不仅为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指导，还为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价值观塑造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四、万隆精神在印尼外交政策中的规范嵌入

自1945年独立以来，印尼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但“自由积极”始终是其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与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等原则高度契合。

（一）印尼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

苏加诺时期（1945—1967年）是印尼外交政策的奠基阶段。在这一时期，以“自由积极”为核心的外交理念正式确立。印尼“自由积极”外交原则的确立可以追溯到1948年，由印尼首任总理哈达首次提出。^①这一原则随后成为印尼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并在万隆会议中得到充分体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自由积极”原则至少包含了五个层面的内涵：不与任何对立集团结盟、积极参与世界和平建设、在两大阵营间保持平衡、平衡对外经济关系、领导发展中国家反对新帝国主义。^②由此可见，苏加诺和哈达等人都属于规范创新者，他们所创造的这些原则性立场与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等理念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印尼外交政策的规范基础。

苏加诺政府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试图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彰显了印尼的外交抱负，也为其后续的外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规范指导。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理想主义特征，强调反帝反殖、南南团结以及亚非国家的共同发展。

苏哈托执政时期（1967—1998年）印尼的外交政策转向实用主义。新秩序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积极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同时通过东盟平台扩大地区影响力。虽然印尼的外交实践呈现出明显的亲西方倾向，但“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并未改变，这体现了万隆精神的持久影响。苏哈托政府巧妙地将万隆精神中的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等理念，

^① Malikul Kusno, “Bung Hatta dan Politik Bebas Aktif Indonesia”, *Konfrontasi: Jurnal Kultural, Ekonomi dan Perubahan Sosial*, Vol. 1, No. 1, 2014, hlm. 12-13.

^② M. Syafiq Syeirozi, *Mohammad Hatta: Bapak Ekonomi Indonesia*, Yogyakarta: I-Boekoe, 2022, hlm.22-25.

转化为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维护地区稳定的实践指南。

民主转型后（1998年至今），印尼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更为均衡和多元的特征。一方面，印尼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取向，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印尼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气候变化、反恐、海洋合作等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一时期，万隆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当代全球治理的新议题，如推动全球南方对话、促进文明交流等。在气候变化方面，印尼积极推动“巴厘路线图”的达成；在数字经济领域，印尼倡导建立包容、公平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这些实践表明，万隆精神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二）万隆精神的规范性影响

首先，万隆精神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和平共处原则的贯彻上。这一原则不仅指导印尼处理与邻国关系，也成为其参与地区事务的基本准则。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印尼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在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中，印尼坚持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些都与万隆精神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

印尼与东帝汶陆地边界划界谈判是万隆精神在当代外交实践中发挥规范引导作用的典型案例。2023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秉持万隆精神中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核心理念，积极重启与东帝汶的边界谈判。特别是在东帝汶获准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的历史性时刻，印尼外长雷特诺（Retno Marsudi）与东帝汶外长弗雷塔斯（Bendito Dos Santos Freitas）在东盟框架下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以建设性态度解决两国陆地边界存续已久的纠纷。^①这一谈判进程充分体现了印尼对万隆精神的现代诠释：首先，印尼选择多边框架下处理双边争议，体现了对话协商的原则。其次，印尼主动提出在东努沙登加拉和欧库西—安贝诺边境地区建设经济区的倡议，展现了互利共赢的精神。最后，印尼作为地区大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展现出的包容态度，反映了万隆精神对其外交行为的规范约束作用。这一案例说明，万隆精神不仅为印尼处理地区事务提供了规范指引，也彰显了其作为建设

^① “Menlu RI, Timor Leste Sepakat Selesaikan Isu Perbatasan”, *Antara*, Juli 15, 2023, <https://www.antaraneews.com/berita/3636690/menlu-ri-timor-leste-sepakat-selesaikan-isu-perbatasan>.

性规范的现实意义。

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规范基础深深植根于万隆精神。印尼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始终坚持不结盟、不依附的原则，这既是对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坚持，也是对本国战略利益的理性考量。在当前全球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印尼更加注重维护战略自主性，这种政策取向与万隆精神所倡导的独立自主精神高度契合。

印尼在政治安全上秉持平衡中美两国影响的做法，在有限引入美国势力的同时，谨慎处理与中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这是印尼践行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典型案列。印尼政府意识到，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可以增强其国防能力，特别是在海上安全和反恐领域，但同时也需要避免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大国，以保持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多元性。^①例如，印尼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某些非正式会议，以显示自己对区域安全的关注，同时又不正式加入该机制，以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对抗。这种做法体现了印尼在缓解国内对华焦虑与不破坏中印尼经济合作大局之间取得平衡的努力。印尼通过这种灵活的外交手段，既强化了与美国的合作，又保持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展现了在大国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智慧。

在多边主义与南南合作方面，万隆精神的制度化影响尤为显著。印尼是东盟的重要创始成员国，积极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这种多边主义实践可以视为万隆精神在区域合作层面的具体体现。同时，印尼也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通过亚非会议、G20、东盟峰会等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这同样体现了万隆精神的现代价值。首先是在全球南方对话机制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印尼积极推动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NAASP）的建立，通过举办亚非峰会 60 周年纪念活动、亚非部长级会议、亚非首脑会议等方式，^②重振万隆精神在南南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在 2022 年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印尼提出“共同复苏，强劲复苏”的主题，避免空谈、避免形式化，而是注重合作，共创世界更美好的未来，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③这些都是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具体实践。

① 韦红、王翥哲：《印尼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对华策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66—67 页。

② “Transkripsi Pidato Presiden RI Pada Pembukaan Konferensi Asia Afrika 2015, DI JCC, Jakarta, 22 April 2015”, Sekretariat Kabinet Republik Indonesia, April 22, 2015, <https://setkab.go.id/transkripsi-pidato-presiden-ri-pada-pembukaan-konferensi-asia-afrika-2015-di-jcc-jakarta-22-april-2015/>.

③ 《专访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人民网，2022 年 10 月 1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1015/c1002-32545683.html>。

其次，在文明对话领域的积极作为。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致力于推动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例如，印尼倡议建立“巴厘民主论坛”（Bali Democracy Forum），通过制度化平台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同时，印尼也积极参与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的活动，^①将万隆精神中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理念运用到跨文明对话中。

最后，在地区多边合作中的创新实践。印尼提出“印太展望”（Indo-Pacific Outlook）的概念，强调开放、包容、透明、尊重国际法等原则，这些都与万隆精神的理念一脉相承。在东盟框架下，印尼推动建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这种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共同体构想充分体现了万隆精神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

（三）规范内化的制度机制

从规范扩散理论视角来看，作为一种国际规范，万隆精神在印尼外交政策中的内化过程体现了规范从国际层面向国内制度转化的复杂机制。制度化路径、规范—利益互动以及实践创新这三个维度能够阐释万隆精神对印尼外交政策的规范塑造过程。

从制度化路径与多层次治理视角来看，万隆精神在印尼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规范性嵌入主要通过三个制度化渠道来实现。第一，作为政策规划的核心机构，外交部将万隆精神的基本原则纳入政策制定框架，这一做法体现在外交部的年度外交白皮书和中长期战略规划中。第二，通过政策审议和监督机制，印尼国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确保外交政策符合独立自主原则，特别是在涉及对外军事合作等敏感议题时发挥关键作用。第三，总统府和内阁协调部通过跨部门协调机制，将万隆精神的现代诠释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推动多边主义与南南合作实践。这种多层次的制度化安排确保了规范内化过程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在规范扩散理论框架下，规范与利益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互动特征。印尼的实践表明，规范内化并非简单的价值追求，而是与国家利

^① “Engaging the Youth in Increasing Religious Tolerance Awareness Through Online Peace Narrative Campaigns to Safeguard Religious Sites (Indonesia)”, UNAOC, <https://www.unaoc.org/ysf-winner/engaging-the-youth-in-increasing-religious-tolerance-awareness-through-online-peace-narrative-campaigns-to-safeguard-religious-sites-indonesia/>,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3日。

益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规范价值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具有制约和引导作用。以印尼对华关系为例,尽管经济利益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驱动力,但“自由积极”原则始终发挥着规范性约束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和平对话立场;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中注重项目主权性;在区域合作中保持战略自主性。其次,规范优势也被积极转化为国家利益的实现工具。印尼通过倡导“印太观”,既彰显了万隆精神的包容性价值,也提升了自身的地区影响力。^①这种规范—利益的良性互动印证了规范扩散理论中关于行为体能动性(agency)的论断。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印尼在坚持规范核心的同时,展现出显著的创新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增强。以印尼—澳大利亚安全协议(AMS)为例,印尼通过创造性解释,实现了对“自由积极”原则的现代转化,既保持了规范连续性,又拓展了务实合作空间。^②第二,规范实践的制度化程度获得提升。随着印尼民主政治的深化,外交决策机制日趋成熟,规范考量从政治话语层面逐步深入到具体政策的执行层面。这种转变使得规范内化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第三,规范创新与国家战略的结合更加紧密。在“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和区域多边外交中,印尼将万隆精神的理念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国际议题,展现了规范的适应性。

总的来看,万隆精神在印尼外交政策中的规范嵌入是一个渐进的、多层次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规范的持久影响力,也展现了印尼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实外交资源的智慧。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深入理解这一规范嵌入过程,对于把握印尼外交政策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万隆精神的规范影响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印尼国家实力的提升,这一规范体系也在不断调整和创新。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坚持核心理念的同时与时俱进,将是印尼外交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也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动态的视角来理解万隆精神与印尼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

^① Damian Wnukowski, “Balancing ASEAN, the US and China: Indonesia’s Bebas-aktif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4, No. 4, 2015, pp. 115-137.

^② Rizal Sukma, “Indonesia’s Bebas-Aktif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ecurity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1, No. 2, 1997, pp. 231-241.

五、中印尼关系中的规范实践

随着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中印尼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规范因素的影响。中印尼两国既是万隆会议的重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也是万隆精神在当代最活跃的实践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尼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而中国是万隆会议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两国的双边互动是观察万隆精神如何从历史遗产转化为现实规范最直接的案例。通过考察中印尼关系中的规范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万隆精神如何突破时代局限，在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文明对话等方面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深入理解这一重要历史遗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持久影响力和现实意义。

（一）中印尼双边关系的规范演进

中印尼关系的规范演进经历了从互不了解到相互理解，从规范约束到规范共建的复杂过程。在建交前，两国的互动主要受制于殖民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约束。印尼独立后，苏加诺政府积极推动与新中国的交往，两国在反帝反殖的共同诉求下建立了初步联系。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尼，与苏加诺总统就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奠定了重要的规范基础。苏加诺总统执政时期（1950—1965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又团结又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尽管印尼排华问题始终未获根本解决，但印尼一度成为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民族主义国家之一。^①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和地区政治变革严重制约着中印尼关系的发展。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变”并掀起排华浪潮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规范互动几乎完全中断。这一时期的经历表明，在缺乏共同的规范认知和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双边关系极易受到国际体系变化的冲击。直到1990年两国复交，中印尼才重新开启了规范建构的进程。

进入21世纪，中印尼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进入新的发

^① 刘新生：《中国与印尼破镜重圆》，《湘潮》，2010年第3期，第34页。

展阶段。这种伙伴关系的规范基础不仅包含传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融入了互利共赢、包容发展等新理念。2013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双边关系的规范内涵。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总统执政10年间，中印尼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2021年6月，中印尼建立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2022年11月两国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2023年10月，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建立。2024年3月，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第一时间访问中国，正式就职后再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体现了印尼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同年11月，中印尼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万隆精神在中印尼双边关系中的具体实践

作为中印尼关系的重要规范遗产，万隆精神在中印尼关系的互动中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在政治互信方面，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两国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四轮驱动”合作日益密切，并升级为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五大支柱”合作，定期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纳土纳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的问题上，双方一向主张并在实践中通过双边友好沟通与协商妥善处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023年，东盟首次海上联合军演原定地点为纳土纳海域，主办国印尼特意将演习地转移至南海以外，并强调演习旨在人道救援和海上巡逻，而非加剧区域紧张局势。^①新任总统普拉博沃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印尼就重叠海域开发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双方同意设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共同推进渔业资源合作。^②在纳土纳问题上，印尼对华政策并未出现重大转向，凸显了印尼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始终坚持的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性，在主权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第二，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自主。第三，通过多边机制和双边对话管控分歧，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这种既重视国家安全又注重经济发展的平衡策

^① 《东盟首次海上联合演习，外媒扯上中国，学者：过去数年常用的伎俩》，新华网，2023年9月30日，http://www.news.cn/mil/2023-09/20/c_1212270540.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11月11日，第2版。

略，是印尼作为地区大国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的理性选择，也是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生动体现。

经济合作领域的规范实践是万隆精神在双边关系中的显著体现。作为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尼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高度的战略契合性。双方在坚持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黄金印尼 2045”战略的对接，不仅深化了双边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借鉴。^①近 10 年来，中国是印尼最大贸易伙伴，是印尼第二大外资来源国，而印尼也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这种基于战略自主和主权平等原则的发展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南南合作的新范式。具体而言，共建“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雅加达—万隆高铁、“区域综合经济走廊”、青山工业园、中印尼“两国双园”等旗舰项目的实施，不仅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范式。^②两国在投资、贸易、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加上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海上共同开发合作，不断深化了两国的全方位互利合作，体现了万隆精神中的互利互惠原则。

在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方面，中印尼两国建立了部长级的人文交流机制，两国文化、旅游、教育、农业、卫生、青年、媒体、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发展。孔子学院的设立、留学生交换项目的开展、文化年活动的举办等，都促进了民心相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青年一代对万隆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诠释，为这一历史遗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青年一代注重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和科技创新来促进相互理解和合作，同时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以应对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他们将万隆精神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致力于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

在地区安全治理层面，中印尼共同推动建立了多个对话协商机制。两国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签署了司法互助协议、引渡条约，建立了反恐磋商机制、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航天合作联委会、卫生合作联委会等，展现了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

^① 潘玥、许利平：《从共同现代化到共建命运共同体——佐科政府以来的中印尼关系》，《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7期，第14—31页。

^② 《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4年11月12日，第2版。

胁的决心。除了积极加强安全战略沟通，中印尼还通过开展联合军演，在提升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的同时增强了双边防务互信。自2011年首次举办“利刃—2011”特种部队联合训练^①以来，两国连续开展了6次涵盖海军、陆军以及特种部队的军事演习与协同训练，不仅通过进行实战模拟和联合行动规划提升应对区域安全威胁的能力，还通过举行海上搜救与人道主义救援，反恐、反海盗军事演习等联合军演来加强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24年12月，中印尼举办“和平神鹰—2024”联合军演，两国首次派出陆、海、空三军进行了海空搜救与探测、人道主义救援与灾害减灾、两栖登陆与伞降投送等多维度、全方位的联合演习。^②这种合作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安全同盟思维，开创了基于规范共识的安全合作新路径。

（三）中印尼关系中规范性力量的实践路径

作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规范性力量强调规范、观念和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塑造作用。在中印尼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万隆精神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通过影响双方的价值认知、行为选择和互动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双边关系实践范式。从规范内化、制度构建和实践创新三个维度，我们可以窥见规范性力量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具体运作。

第一，规范内化的和平实践路径。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通过双方的持续互动和制度化实践，逐步内化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内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争议管控方面，两国建立了涵盖外交、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多层次对话机制，通过制度化渠道化解分歧。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印尼双方不仅通过双边磋商机制保持沟通，还共同推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达成和《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谈判进程，展现了和平解决争端的规范引领作用。二是在危机预防方面，两国建立了外交、国防等部门间的定期会晤机制，通过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有效预防了潜在冲突的升级，为地区和平秩序的维护提供了示范。

第二，制度构建的互信深化路径。万隆精神强调的相互尊重原则，

^① 《中国与印尼“利刃—2011”特种部队联合训练结训》，中国政府网，2011年6月17日，https://www.gov.cn/jrzq/2011-06/17/content_1886776.htm。

^② 《中印尼“和平神鹰—2024”联演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4年12月2日，<http://www.mod.gov.cn/gfbw/jsxd/ly/16355490.html>。

通过双方在不同领域的制度性安排，转化为具体的互信建设机制。这种制度构建呈现出多层次性特征：在战略层面，两国通过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共同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愿景；在政策层面，双方相互理解并支持彼此的核心关切，如中国理解并尊重印尼“自由积极”的外交传统，印尼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实践层面，两国在多边平台如联合国、东盟、G20等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展现了互信合作的制度化成果。这种多维度的制度构建不仅深化了双边互信，也为地区合作提供了制度范式。

第三，实践创新的共同发展路径。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突破传统的南南合作模式，构建更加平等、互惠的发展伙伴关系。这种创新实践主要通过三个机制来实现：一是战略对接机制，共建“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展现了战略协同的新范式；二是项目合作机制，雅万高铁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三是产能合作机制，青山工业园、中印尼“两国双园”等产能合作示范园区的建设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模式。^①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推动了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更为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新型范式。

可见，规范性力量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实践路径呈现出规范内化、制度构建和实践创新的多维特征。这种多维度的规范实践不仅深化了双边合作，也为发展中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革，这种基于规范性力量的关系发展模式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印尼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

（四）中印尼关系中规范内化的深层机制

作为规范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最终阶段，规范内化（norm internalization）反映了行为体将外部规范转化为内在认知和自觉行动的复杂过程。在中印尼关系语境下，万隆精神的规范内化既体现了两国对特定行为准则的共同认可，也反映了双方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深层制度化认知。从利益融合、身份建构与制度互动三个维度，可以系统展现规范内化的深层机制。

利益融合是规范内化的物质基础。持续的利益交融能够推动规范

^① 潘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企赴印尼投资的产业互惠探索——以青山工业园为例》，左志刚主编：《印度尼西亚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23~20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236—237页。

从工具性认知向价值性认同转化。中印尼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人文交流等传统领域的利益契合，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新兴议题上的协作需求相互交织，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融合格局。这种利益融合既强化了双方对合作规范的工具性依赖，也促进了对规范价值的深层认同。在共建“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过程中，两国通过项目合作、产能对接、投资促进等务实举措，将共同利益转化为规范遵循的内生动力。

身份建构深化了规范内化的认知基础。身份认同是行为体接受和内化规范的关键中介变量。中印尼作为具有相似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大国，在后殖民语境下形成了深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建立在共同历史记忆和发展经验基础上的身份认同，使得两国在全球治理变革、国际秩序重构等重大议题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共识立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国在全球南方合作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作为新兴大国的身份认知也在不断强化，这种动态演进的身份建构过程持续深化着规范内化的社会基础。

持续的制度化互动可以降低规范内化的交易成本，提升规范遵循的可预期性。中印尼通过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建立双边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等多层次沟通机制，为规范内化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两国借助高频率的战略沟通，不断巩固政策协调的制度化基础。这种多层次、常态化的制度互动既确保了规范传播的持续性，也增强了规范内化的制度韧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维度的规范内化机制并非彼此独立的运作，而是通过复杂的互动关系共同推动规范从外部约束向内在认同转化。利益融合为身份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身份认同则强化了制度互动的内生动力，而制度化互动又反过来巩固了利益融合和身份建构。这种良性互动循环确保了中印尼关系规范内化进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双边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的来说，中印尼关系的规范实践深刻体现了万隆精神的现代意义，为全球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与价值。这一实践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均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意义。尽管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阶段方面存在差异，但通过持续的对话交流，成功构建起共同的规范认知，进而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这种基于规范共识的合作模式，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动拓展了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为塑造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了智慧和经验。

六、展望：万隆精神的当代价值与挑战

在 2024 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 周年、2025 年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深入探讨万隆精神这一规范性遗产更具特殊意义。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包容发展等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当前，万隆精神在实践中面临三重挑战：首先是国家利益与规范价值的张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单边主义措施，与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平等互利原则产生了冲突；其次是文化认知与战略理性的平衡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但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偏差仍然存在，这影响着国家间互信的建立和合作的深入开展；最后是全球化背景下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挑战，既体现为国家内部群体的认同分化，也表现为国际舞台上角色定位的模糊化。

为应对这些挑战，创新实践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区域层面，应构建更加包容的合作机制，推动建立开放、透明、共赢的区域秩序。在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应该凝聚共识、发出共同声音，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新方案。同时，应通过制度创新强化规范性外交的实践基础，建立更加有效的多边协商机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展望未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不合理的国际体系面临更大的改革压力，万隆精神将在三个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规范支撑，二是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行动指南，三是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提供思想资源。作为亚洲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精神在当今全球治理变革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创新力。中印尼两国作为万隆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应继续加强合作，创新实践方式和合作机制，推动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通过持续探索和实践，万隆精神必将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动力，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印记，成为推动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不仅关乎中印尼双边关系的发展，更是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责任编辑：王国平]